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北”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许欣舸

2015年6月27—28日,由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保定抗战历史研究会主办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北”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北保定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以及日本小樽商科大学、京都产业大学、山形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60余人参会,就抗日战争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抗战时期的中共组织建设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谢忠厚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例,论述了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指出根据地具有抗击日军和改造旧社会、开创新社会的双重任务。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凝聚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就是在这种精神引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也为尔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建立新中国构建了宏伟桥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玉蓉总结了中共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在地方政权建设、坚持抗战及经济建设方面的历程与经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梁馨蕾勾勒了1938—1944年间中共冀东农村党组织基本的运作情况。冀东根据地在力量薄弱地区积极发展党员,在相对稳固的地区开展整理、洗刷工作,整顿巩固组织。星罗棋布的农村支部,在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杨豪认为华北革命根据地党员的入党动机呈现出多元性、差异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民族意识、阶级觉悟、对中共的好感和感恩以及个体诉求和需求等方面的动机相互纠结,共同作用,折射出中共革命的复杂面相。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樊云剑概括了40年代中共基层干部“新贵化”的现象,梳理了中共“反新贵”斗争的曲折过程,并总结了斗争的成功经验,以期对当前的中共党风廉政建设提供借鉴。

二、抗战时期的军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将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比作中共坚持抗战的“三驾马车”,考察了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游击战战略地位的确定以及游击战范围由山地扩大到平原的过程。指出游击战和根据地都是对日抵抗系列链条中的一环,根据地是游击战的内线,但游击战依靠的根据地并不是静止、独立的,而是和其他根据地以及更广大的对日抵抗后方构成相互支撑的关系。中共正规军则一直是敌后游击战得以实现的核心力量。中共以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为基础,通过党政军民一体化的总体战,成功完成了持久作战的目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邹铨透过中日文原始档案及相关资料,提出学界通常所认为的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和日军伤亡数不确,考证认为八路军伤亡数为16000余名,日军伤亡数在3297—3931名之间。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邵雍梳理了朝鲜义勇队、义勇军在中共领导下,参加中国抗日战争,并在抗战胜利后走上光复祖国征程的历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龙飞重构了沁源围困战的过程,认为围困作战是

典型的山地游击战,代表了中共基本的抗战方式,是中共抗战的缩影。沁源围困的成功,是中共在根据地长期耕耘的结果,同时表明中共这种广泛发动、武装群众,坚持抗战和守卫根据地的策略是行之有效的。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耿寒星重新梳理了1937年“通州事件”的来龙去脉,认为通州保安队对老人、儿童的杀害和对妇女的侵犯确实存在,但当地的日本居留民并非一般国际法意义上的平民。冀东伪政权的存在,使国民政府无法对通州地区实行有效控制,伪政权应对事件负有一定的责任。文章揭露了日本通过过分宣传“通州事件”,企图激化日本国内对中国的仇恨,以达到煽动国内反华情绪、侵略中国的目的。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侯杰试图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喜峰口战役及二十九军相关史实。作者认为喜峰口战役参与者所构建的群体记忆与史实有不符之处,进而探讨了历史记忆形成机制及史料辨伪问题。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殷向飞以绥远抗战时期国民党与中共、中央与地方、百灵庙蒙政会与绥远省政府、内地与边疆以及中国与日本、苏联等外部势力之间的舆论互动为中心,分析了绥远蒙汉各族在反侵略斗争中的国族认同意识变迁过程,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爱国精神蓬勃壮大的原因及影响,认为抗战使松散的人民融为一体,各族人民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内地与边疆的隔阂也逐步消除,各阶层之间也进一步加深了认同与理解。

三、日军的侵略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同乐概括了日伪在热河省制造“集团部落”的概况、所采取的欺骗手段以及罪恶目的。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刘峰考证认为,日本华北方面军战争初期在华北实行以扶植傀儡政权为核心的“治安战”政策,旨在将华北“第二满洲国化”,未能达到目的。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华北方面军调整“治安战”政策,将目标对准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共,将政治进攻与军事作战结合起来,但仍旧收效甚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秀宁还原了山东省伪政权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文章认为随着战争走势的变化,五次治安运动重点各有不同。

四、抗战时期的经济 天津社会科学院张利民指出,通过考察日本中国驻屯军在政治、经济上的各种行径,可以确定驻屯军在日本对华北侵略中扮演着策划、指挥和执行者的角色,是日本政府在加强军队绝对权威性前提下“军政合一”的直接体现。其所作所为促进了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也强化了华北沦陷区的政治经济统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思考察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华北乡村中的集体村账制度从无到有并最终确立的过程。文章指出,这种新生的、自发的村庄集体账簿制度不同于以往的乡村私有经济记账方式,也与乡村旧有的宗族组织以及青苗会组织的公账制度有别。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村集体村账制度的确立,与乡村社会集体化、组织化进程相表里,并为日后合作化时期的村庄账簿制度奠定了基础。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把增强在肯定华北抗日根据地生产运动的成绩的同时,指出开展生产运动初期,社会各界反应复杂。中共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上的引导和动员,扩大生产运动组成队伍,调动各方生产的积极性,并最终取得显著成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周祖文剖析了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征收的实态。1941年中共引人民主评议以消解政治动员无法解决的公粮畸重问题,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1943年之后,公粮征收逐步走上进行土地调查、强调累进的农业累进税轨道。作者展现了边区农业税征收由救国公粮制到农业累进税制的演进过程。

五、抗战时期的社会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石嘉全面考察了抗战爆发初期日本医疗团体同仁会在沦陷区的卫生防疫制度与措施。作者认为,在日本当局严密控制之下,同仁会性质日益嬗变,其卫生防疫系配合日本侵华国策,在沦陷区实施渗透和“宣抚”政策,藉此培养沦陷区民众的亲日意识,维系其殖民统治。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肖红松认为,天津在沦陷时期毒品问题严重,这可以呈现出日本毒化罪行与中国受害之惨烈情形。华北日伪政权以“禁烟”为名,公开实行鸦片专卖制度,

对沦陷区民众进行赤裸裸的毒化活动,以加深对中国的侵略。

本次会议上两篇女性史的文章值得特别提出。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范红霞认为,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农村妇女角色的重构过程中,中共政权的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妇女自身主动转变角色的努力同样重要。中共通过政策的调整,较好地调适了农村妇女角色重构中的冲突。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郑立柱考察了中共在华北根据地通过完善政策和法律,对寡妇再嫁给予援助,以保障寡妇相关权益的努力,这种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六、抗战时期人物及群体 日本京都产业大学吉田丰子考察了日本外务省决定将济南和青岛的日侨“引扬”(撤离)的决策过程。山形大学吉井文美聚焦华北地区英籍商人那森爱德(E. J. Nathan,开滦煤矿英方总经理)以及英籍天津海关税务司梅维亮(M. R. Myers),考察了30年代后期华北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管辖后,此前在华北与国民政府构建的双边框架下享有经营权益的英国人应对日本的过程。在无法得到英国政府支持的情况下,为维持既有经济利益,两人逐渐“归顺”当地傀儡政权。小樽商科大学今西一介绍了日共著名人士野坂参三的革命生涯,细致地梳理了其与中共及苏联的密切关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吕彤邻认为美国外交官戴维斯和谢伟恩所主张的实用外交,是源于他们抗战时期在中国的外交经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志勇通过研究认为,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对于日本侵华的政策与事实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蒋第一次下野后赴日,曾幻想取得日本的支持,完成北伐,并改变日本的侵华政策,但是最终以失败告终。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日本的侵华政策与蒋的北伐统一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使蒋对日军的残暴以及日本的侵华政策有了更深切的体认,从而促其逐渐由反英转变为反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叶铭考察了徐永昌与抗战初期华北战局的关系。文章认为,蒋介石选用徐永昌担任华北行营主任是一个比较恰当的选择。在华北期间,其最能发挥作用的时机是1937年7月30日至9月20日之间,徐参与拟定华北战场作战方略,积极协调华北各派系将领关系,维持合作抗战局面并指挥监督华北战事。但因大部分时间消耗在内部协调方面,使其工作之成效大打折扣。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刘志琴提出,保定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了保定民众抗日的前奏。保定二师学生的“七六学潮”及河北省立农学院学生对一二·九运动的声援,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对高蠡暴动起到了动员作用,为冀中平原开战游击战争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田苏苏梳理了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地区由学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到民众抗争精神被唤起,再到最终走向全民抗战的过程。

七、抗战研究理论问题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金铮对抗战史研究的现状做了反思,指出应拓宽抗战研究的时空与内容。要注重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加强国际视野。在新理论的启发下,可以提出一些新问题,以扩大和丰富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面相,回应国际史学潮流,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立中国学者自己的话语体系。

本次研讨会涉及议题广泛,讨论热烈而充分,论文大多与华北密切相关,紧扣会议主题。纵观参会学者,年长者已近八旬,年少者方过弱冠,体现了抗战研究薪火相传的现状。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宽,新史料的发现以及研究视野的拓展,抗战研究必将有新的收获。

[作者许欣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士华)